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陀思妥耶夫斯基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北京西四横街胡同四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号：502 767×1092 幅 1/32· $\frac{3}{8}$ 印张·8,000字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7000 定价：0.09 元

費多尔·米哈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二一年十月三十日〔公曆十一月十一日〕——一八八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公曆二月九日〕）是傑出的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父親是瑪麗貧民醫院的醫生；在上完三年（一八三四——三七）寄宿學校以後，父親就把他送到彼得堡軍事工程學校去學習（一八三八——四三）。畢業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工程局繪圖室工作，過了不久，在一八四四年，他退了職。從此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了職業作家的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作品是中篇小說“窮人”（刊登在一八四六年涅克拉索夫的“彼得堡文集”里）。這篇作品的原稿曾被送給涅克拉索夫和別林斯基看過，並得到他們的熱烈的讚賞；不久，作者就加入了當時進步作家的圈子。在“窮人”這部小說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以果戈理的一個學生的身分出現的，他同時並以別林斯基所依據的民主現實主義綱領的精神發揮了果戈理的傳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都是些小人物，小官員，彼得堡“屋角”的居民。作者真實地反映了這些人的痛苦，表現出了他們的人格、他們的精神的純潔和高尚，從而喚起了讀者對這些人的深刻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這部中篇小說對四十年代的進步的現實主義文學有極大影響。但
第二本中篇小說“同貌人（郭里雅德金先生的奇遇）”
里，就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背棄了

“窮人”里面那种社会人道主义的倾向，背棄了果戈理和別林斯基的民主主义原則。由于他确信人的性格素來就是有兩面性的这种反动的悲观思想，他肯定地說，人身上除了正面的、道德的願望而外，似乎还存在着自私自利的、邪惡的因素。这一反动观点后来在他的小說中得到了發展。“同貌人”的出現，引起別林斯基的批評，并導致他們二人之間的思想的分裂。这位大批評家对他的中篇小說“女房东”（一八四七）采取更加否定的态度，因为这本书標誌着陀思妥耶夫斯基進一步背棄了果戈理的现实主义傳統。四十年代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寫的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和雜文（“勃罗哈尔慶先生”〔一八四六〕，“白夜”〔一八四八〕，“聖誕樹与婚礼”〔一八四八〕，中篇小說“涅托契卡·涅茨瓦諾娃”的开头部分〔一八四九〕，等）里的主人公都是受迫害的小官員，破落貴族，远离了人民、往往被一种隱伏的虛荣心的慾火所毀滅的平民知識分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反映了这些小資產階級和小市民的心理状态，他們所固有的精神上的徬徨，他們对旧的宗法制度瓦解的恐惧，以及对農奴制度和在俄國建立新的資本主义制度的模糊的抗議。

一八四七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了彼特拉謝夫斯基革命小組，在那里，他研究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窮人”里已經反映了他对这种思想的認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特拉謝夫斯基分子的會議上，朗讀了別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信的内容是对農奴制度激烈的反抗），这个小組企圖組織一个秘密印刷所，他也参加了这件事。在他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上虽然还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在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事件的影响下，却参加了斯別什涅夫所組織的秘密革命团体。一八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和彼特拉謝夫斯基分子一道被捕。在彼得保罗要塞內关了八个月之后，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彼得堡謝苗諾夫

校場扮演了一幕把彼特拉謝夫斯基分子（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內）處死刑的把戲。被判罪的人都被蒙上了眼睛，第一批罪犯們被送上刑台要去槍決，緊接着就宣佈撤銷對他們死刑的判決。鄂木斯克苦役監禁期滿後（一八五〇——五四），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派到塞茲巴拉廷斯克的西伯利亞邊防軍當普通兵。他取得了軍官職位以後，於一八五九年退休，遷往特威爾，同年年底，才得到許可回到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記”（一八六一——六二）里，真實地描寫了沙皇的勞役的可怕情景，這部作品被列為俄國古典文學的傑作之一。苦役在作家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創傷，加重了他的疾病（癲癇病）。在西伯利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動世界觀完全形成了，而這種反動世界觀的特征早在四十年代末尾就已經顯現出來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八五九年恢復文學活動（中篇小說“叔叔的夢”“斯捷潘契柯沃村及其居民”），在從苦役地點回來以後的頭幾年，顯出他與四十年代現實主義學派的傳統還沒有失掉的关系。

六十年代初期，除“死屋手記”外，他還寫了長篇小說“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一八六一），後者綜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早年所寫的取材於彼得堡屋角的貧民生活的中篇小說的基本主題。在這期間，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合作，先後出版了兩種雜誌“時間”（一八六一——六三）和“時代”（一八六四——六五），在這些雜誌上，他攻擊六十年代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領袖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哲學觀點和政治立場。

陀思妥耶夫斯基此後的一切的創作和活動是和他的背棄解放運動联系着的。他用自己的反動綱領“根基主義”與革命民主主義者相對立。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認人民是民族生活的基

礎，并宣稱知識分子必須與“根基”，與人民接近，同時，他在自己的理論上却追隨着斯拉夫派的學說，他硬說俄羅斯人民有着一種他們本性上原來沒有的“溫順”和信教的性格，并以當時人民生活中最因循和最落后的特征作為自己“根基”的理想。與革命民主主義者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把俄羅斯偉大的未來與革命和社會主義聯繫起來，而是把它與脫離鬥爭的、與基督教所認為能拯救人民於貧困和奴役的溫順馴良的唯心主義思想聯繫在一起。雖然如此，作家的充滿了困難和矛盾的生活道路，使他面對着一些重大的社會問題，即在宗法制生活方式瓦解和俄國從農奴制度過渡到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下所產生的那些問題。作為一個藝術家和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擺脫這種發展的殘酷的矛盾，以及由這種矛盾所產生的社會悲劇。他感覺到隱藏在社會底層中的精神力量，正是因為這樣，他才能在“死屋手記”中創造了從人民中來的許多有力的人物形象，這些形象對於作家本人的反動思想來說乃是一種顯明的反駁。陀思妥耶夫斯基經常注意着俄羅斯民族的發展的基本問題和思考着在與資本主義西方比較下的它的歷史道路的特征，深入地揭發了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以及他在西歐國家所能看見的資產階級文化中的絕無人道的各方面。在“冬天所記的夏天印象”（一八六三）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滿懷憤怒地批判了資本主義英國，鮮明地描繪了由於資產階級勝利而引起的法國文化的衰落，描繪了西歐資本主義文明的殘酷和無恥，揭露了變得粗野的資產者的個人主義和道德墮落。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指責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和嘲笑膚淺的自由主義的“進步分子”的同時，卻完全脫離了進步思想，甚至把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性也否定了。

在“地下室手記”（一八六四）中，作家把人性的兩面性

的有害思想和他对于智慧的創造力量的怀疑与車尔尼雪夫斯基的先進的唯物主义哲学及其对于人、对于社会主义的未來勝利的光輝的信心，作了一个对照。用高尔基的話來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把人描寫成为“在黑暗势力的紊乱状态中孤立無援的人”。

一八六六年，在对六十年代民主运动進行过斗争的“俄罗斯公报”雜誌上，出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重要的長篇小說“罪与罰”。小說的主人公大学生拉斯科里尼可夫在貧困、傲慢和受了伤害的自尊心的影响下，創造了一种認為强而有力的个人有权犯罪的無政府主义理論，他把犯罪当作是对于使大多数人服从的統治世界的不公平現象的抗議。他犯了殺人罪以后，又痛苦地感受到自己謬誤行为的后果，感到孤独和“自絕于人类”，最后，在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下，他終於走上了精神再生的道路。索尼亞·馬尔梅拉朵娃成为了他的領導者，她是一个耽于飲酒的官員的女兒，貧困使她为了要拯救自己的弟弟和妹妹免于餓死，而迫得賣笑街头。虽則遭受着凌辱和痛苦，索尼亞却滿怀着基督教的爱的感情和自我牺牲的決心。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圖，長篇小說“罪与罰”是反对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企圖把一个兼有个人主义、虛荣心、病态的自豪感、脱离社会的小資產階級的孤独者的典型，想像为一个能够表现出俄國社会的急進思想和願望的人的典型。作家热情奋發地頌揚了拉斯科里尼可夫和自己的其他一些主人公所具有的那种对社会准則的“否定”，同时又把他們冒充为热情的無神論者和唯物主义者，反对世界邪惡的虛構的造反者，而归根結底則是要揭穿他們，引導他們走向精神上的崩潰和放棄造反的行动。这种反动的傾向还是不能消滅这一幅富有戲劇性和揭發力量的、处于貧窮和無权的压迫之下的社会下層生活的

景象。“罪与罰”充滿極其悲慘而緊張的氣氛，把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所引起的深重的社會罪惡揭發出來了；小說中也淋漓盡致地描繪了當時正在成長的資產階級關係的鄙陋乖戾（斯維德里加洛夫的形象）。在描寫拉斯科里尼可夫傾向於“有力的個人”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時，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了個人主義對社會及人有毀滅性的力量。正是小說中這種具有揭發性的內容，確定了它在俄國文學里的意義。

一八六七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國，在國外住了四年。他在那里寫了長篇小說“白痴”（一八六八）。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在這部小說中創造一個合乎自己的反動理想的“優秀正面”人物的形象。這種意圖在有點愚笨、具有“福音書中所說的”純朴和溫厚的梅什金公爵那個病態的形象里體現出來了。同時這部小說表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上所特有的主題，即脫離了人民的那些社會階層的頹廢和腐化。這個主題在商人羅戈仁的形象里表現得特別明顯，在小說里，還看出這個商人的精神混亂、狂妄和道德敗壞。在國外，他寫了長篇小說“惡魔”（一八七一——七二），這是一本瘋狂的、旨在反對俄國解放運動並成為政治上反動的旗幟的誹謗書。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部長篇小說中採用了巴枯寧主義者涅查耶夫建立一個反叛組織的過程的材料。陀思妥耶夫斯基歪曲了俄國解放運動的本質，把在失掉了階級性的城市居民的墮落環境中所產生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地下活動的特征，妄加在它的身上，這種活動使自己的參加者採取騎牆態度和犯刑事罪。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四十年代的進步人士和六十至七十年代的革命者們誣蔑地描寫成為與俄國社會道德的逐漸“敗壞”同樣相連的兩個環節。在這部長篇小說里也描繪出了一羣墮落了的宮廷貴族（斯塔弗羅金）和小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地下活動”者，以及叛徒、奸細的形象。

一八七三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編輯反動的宮廷政論家麥謝爾斯基公爵辦的保皇黨雜誌“公民”。在這裡出現了充滿“反駁、推翻社會主義”（高爾基）的情緒的“作家日記”。後來（一八七六——八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了“作家日記”的單行本。同時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大力揭露好戰的德意志的民族主義和俾斯麥的對外政策。除了政論而外，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在“作家日記”里刊登了幾個短篇小說和素描（“荒唐人的夢”，“溫和的女人”，回憶別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等等）。繼“惡魔”以後的長篇小說是“少年”（一八七五），這部作品的主题是描寫一個在“偶然湊合起來的家庭”中成長的思想上徬徨的青年。在這部書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巡禮者馬卡爾·朵爾果魯基——一個具有基督教的溫順和臆想的“人民的真理”的思想的代表人物——的形象里，表現了自己的美好的理想。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卡拉瑪卓夫兄弟”（一八七九——八〇）里，描寫了卡拉馬卓夫貴族家庭墮落的歷史，描寫了脫離人民的知識分子思想上的徬徨。在奴才斯美爾吉亞可夫這個人物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鮮明地描繪出了在資產階級關係所統治的世界裡精神和肉體上都充分墮落的醜惡特征。斯美爾吉亞可夫一方面在自己的卑鄙的意識中反映出伊凡·卡拉瑪卓夫的自私自利的“哲學”，他同時相信“聰明人”做什麼都是對的。在伊凡的形象中，作家又極力表現出自己的最反動的思想，好像唯物主義及無神論會使一個人失去一切道德上的支持力量，會使他精神頹廢和犯罪。然而，事實上伊凡·卡拉瑪卓夫，正如拉斯科里尼可夫一樣，並沒有走出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觀念的狹小圈子。在一個寺院裡受教養的小卡拉瑪卓夫——阿遼夏和他的精神領導者、夢想使正教會在社會上起領導作用的“長老”卓西瑪，便是陀思妥耶夫斯

基本人的道德理想的代表人物。在寫“卡拉瑪卓夫兄弟”的同時，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寫了一本“關於普希金的講話”（一八八〇），在這本書里，他指責了革命知識分子的“驕矜”，並号召他們“順從”和“崇拜”那個與宗教、專制政體、放棄鬥爭混為一談的“人民的真理”。“關於普希金的講話”在俄國社會一部分人士身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民主主義陣營的優秀代表們（如鄔斯賓斯基）都深刻地認識了它的反動的性質。

作為一個偉大藝術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夠為了迎合自己的反動綱領而在描繪人民的命運時完全放棄俄羅斯民族文學所固有的生活真實的原則。雖然那些最深刻的矛盾毀壞了他的作品的許多篇幅，他在許多方面還是與俄國現實主義學派的藝術經驗聯系着。確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意義的是：他極其尖銳地，有時甚至是過份尖銳地評論當時俄國社會里的顯明的社會矛盾現象，他以最緊湊的體裁，最大的戲劇性反映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意識的危機，並以自己的藝術技巧把俄國社會的發展的許多重要問題表現為具有悲劇的色彩。他揭露貧與富、無權與專橫、孱弱與強暴之間的矛盾，但是在指出這些矛盾時，他總是号召不要走向鬥爭和抗議，而要走向馴服和宗教，他号召人們去受苦受難來模糊鬥爭的道路。陀思妥耶夫斯基從謬誤的立場批評俄國和西歐的階級社會，他與革命的思想作鬥爭，但暴露社會的矛盾的熱情仍然表現在他的創作里。他以高度的技巧描繪了被貧困和無權所摧殘的城市下層羣眾的艱苦境況，描寫出那種由個人主義和脫離人民所導致的苦惱的思想上的徬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反動的作品里可以見到真實的、以諷刺筆調揭發出來的宮廷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的特征決定了他技巧的主要特點。作家差不多總是選擇住滿了貧苦小市民的潮濕而陰暗的城

市街区作为自己小說中故事發生的地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情節的發展，以其戲劇性，从一个緊張場面到另一个緊張場面的急速轉變；時間上的異常緊湊为其特色。對話在他的小說中佔特別的位置，这种對話常常轉變为某一个主角所独有的充滿着热情的自白。談話、辯駁、思想冲突的場面常常成为故事的中心樞紐。陀思妥耶夫斯基虽有卓越的藝術技巧，但他的風格是有着深刻的內在矛盾的，除了严格的现实主义外，它还包含着不正确的反现实主义的和神秘的特征。

还在作家生前，他的作品就已聞名全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后来文学的影响是兩面性的；一方面他的小說中激烈而尖锐地提出來的社会問題常常引起了各國進步作家的注意，另一方面，他的頹廢的宗教神秘的思想影响了帝國主义时代西欧和美國資產階級的頹廢派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沙皇俄國統治階級的精神生活和文学產生着最大影响的时期，要算是随着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后而到來的反动年代。当时思想上的反动派和資產階級頹廢派文学力圖抬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反对革命和反对俄國古典文学偉大现实主义傳統。一九一三年高尔基曾經反对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和这些观点的理想化。列寧在指責“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惡劣的地方的最惡劣的倣效”的时候，曾經反对过那些企圖“胡乱地描繪恐怖現象，震駭自己的想像和讀者，把自己和讀者都‘打傻’了”（“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五卷第一〇七頁）的文学家們。高尔基一方面承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天才，同时也反对他的对革命有害的思想，并对想使这些思想复活的各种企圖提出了抗議。苏联的作家們和苏联文学批評界正繼續着高尔基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反动方面的斗争，并繼續反对現代外國反动派的僕从們对于这些反动方面的推崇的斗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

- “藝術作品全集”，第一——十三卷，列寧格勒，一九二六——三〇；
“全集”，第一——二十三卷，聖彼得堡，一九一一——一八；
“選集”，莫斯科，一九四六；
“書信集”第一——三卷，莫斯科——列寧格勒，一九二八——三四；
“窮人”，莫斯科——列寧格勒，一九四七；
“罪與罰”，莫斯科——列寧格勒，一九四八；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列寧格勒，一九四七；
“卡拉瑪卓夫兄弟”，第一——二卷，莫斯科，一九三五；
“少年”，莫斯科——列寧格勒，一九四七。

參考書目

- 別林斯基：“彼得堡文集”，三卷集，莫斯科，一九四八；
同上，“一八四六年俄國文學一瞥”，同上；
同上，“一八四七年俄國文學一瞥”，同上；
杜勃羅留波夫：“受壓制的人們”，全集，卷二，莫斯科，一九三五；
皮沙烈夫：“毀滅了的和正在毀滅的人們”，全集，卷五，第五版，聖彼得堡，一九一一；
同上，“為生活而鬥爭”，同上，卷六，第五版，聖彼得堡，一九一三；
高爾基：“談談小市民習氣”，載于高爾基“文藝批評論文集”，莫斯科，一九三七；
同上，“論卡拉瑪卓夫性格”，同上；
同上，“再論卡拉瑪卓夫性格”，同上；
盧那察爾斯基：“俄羅斯文學”，論文選集，莫斯科，一九四七；
格羅斯曼：“費·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和創作”，附有年代與文獻的傳略，莫斯科，一九三五；

- 別列契科夫：“彼特拉謝夫斯基革命黨人審判案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莫斯科——列寧格勒，一九三六；
- 叶尔米洛夫：“反对費·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反动思想”，演
講速記稿，莫斯科，一九四八；
- 扎斯拉夫斯基：“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动观点的理想化”，“文化与
生活”，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第三十五期；
- 弗朗盖利：“回憶一八五四至一八五六年西伯利亞的費·米·陀思妥耶
夫斯基”，聖彼得堡，一九一二；
- 科尼：“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回憶錄，彼得堡，一九二
一；
- 陀思妥耶夫斯卡雅：“有关一八四六至一九〇三年費·米·陀思妥耶夫
斯基的生平和活动的著作和藝術作品索引”，彼得堡，一九〇六；
- 索科洛夫：“一九〇三至一九二三年費·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編目
資料”，載“費·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論文与資料”，文集第二卷，
列寧格勒——莫斯科，一九二四。

原名 Достоевский

譯者 舒章

校者 袁湘生

譯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十五卷